

## 第一章 何謂全球化資訊社會？

想必讀者一定留意到，有許多人都聲稱我們已然進入一個嶄新的年代，此年代是由一「新典範」所控管，在其間，社會及其經濟關係不再如往昔般主要是建構在物質商品的基礎上。這些論者更進一步地表示，現在諸事萬物都遵循著資訊和知識的基礎而組織，即使當前境況並非如此，也為期不遠。這樣的情況，通常被稱為一個(全球化)資訊社會的來臨，在有些討論中則被視為「微重量的世界」(weightless world)或是煥然一新的網路社會(network society)降臨了，在過去，這個轉變曾經被描繪成後工業或服務性社會到來所展現的特徵。在本書中，我將擷取此論調的數個核心元素，並闡述這些說法所刻劃的「轉變」景象，多半只是不真切的「童話」，而無法貼近其真貌。簡而言之，儘管我們所居處的年代，正經歷

了生活型態與實踐模式的多方轉變,但構成我們社會經濟體系的本質,大體仍維持原貌。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網際網路或許是尖端資訊和傳播科技(ICTs)的絕佳代表,它改變了一切。這是一場革命,並形塑了一個新世界。我們以往對於社會的認知,在理解新世界時毫無用武之地。儘管人們宣稱「鉅型論述」(grand narratives)已過時,但資訊社會本身,卻經常採用一種無所不包的敘事觀點來描繪新時代。這種觀點激勵許多人高聲慶賀一個烏托邦即將降臨,但對於其他人而言,這些描述則意味著社會正朝向一個反烏托邦(dystopian)的世界發展,就如同電影《銀翼殺手》(*Bladerunner*,譯者按:銀翼殺手的劇情,主要設定於複製人當道的西元二〇一三年)中的場景。然而,我的觀察立場是抱持質疑的:儘管許多人宣告這是一場革命(無論電視節目和文獻,甚至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都不斷地重複述說該論點),但我們的生活在眾多層面上仍相對地維持原貌。

多數人仍然需要為五斗米折腰,而公司經營者和那些為其效力的人們之間也仍存在著不容忽視的隔閡,這種隔閡不只侷限於「報酬」這個單一面向。當我們檢視是哪些因素讓某些人成為富翁,但其餘的人僅能仰賴微薄的薪資或補助金勉強度日時,就會發現這個問題依舊和「誰擁有什麼」脫不了干係。論及資訊社會時,最重要且經常被指出的轉變之一,就是哪一類的事物能夠衍生出巨大的財富。過去的答案很可能是坐擁一間公司,或擁有土地或樓層的部分所有權(藉由股票或股份);而現在,答案則可能是獲得一部傑出藝術創作(影片,歌曲,書籍)的版權,或是某個創新技術過程的專利。這種嶄新的資產型態被稱作智慧財產權,雖然智慧財產權在許多方面有別於實體資產,但仍無損於我們的分類:某些人

坐擁重要價值，而某些人只得零星甚至一無所有。因此，儘管各種說法都指出，新的資訊與傳播科技正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許多社會型態(特別是財富如何分配)仍舊一如往昔。當我們無視眼前這些以前所未有之驚人速度增生的新鮮產品和服務後，就會發現世界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上述說法是以質疑的觀點來看待資訊時代。儘管這並非唯一的觀點，但當媒體、網際網路或在我和同儕與學生討論此議題時，相較於多數人異口同聲的歡欣鼓舞，採取質疑的立場對我而言顯然更有意義。容我先澄清一點：我並不是強調萬事毫無變化，而是認為這些轉變所造就的影響，實際上影響的程度遠不如他們經常被提及的那般深遠。蘊藏在這些轉變底下的是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而這正是我希望強調的部分。我想挖掘這些關係，因為我不能接受過往累積而來的現代生活珍貴知識，如今已經遭到淘汰或一無是處的說法。那些聲稱我們正邁向一個嶄新時代的說詞，試圖闡割和駁斥的是從現在或上個千禧年以來都還依舊犀利的社會批判主義。我並不想處理過去四十年來資訊革命論點的各项轉變，或是每位作者曾經寫下的主張，因為這將是一個龐大的工程，亦模糊了本書的焦點。我的目標鎖定在特定作者曾經發表過的精闢論點，且更重要的是，在後續的資訊時代討論中，經常引用到這些論點。

我將在本章的其他篇幅扼要地討論資訊社會概念的發展，並以四大核心論點作結。這四大論點是討論新紀元現象時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時更是本書其他章節討論的主軸，因此，這些論點在過去三十年間，也經常被反覆提出，分別是：

- 我們正經歷一場社會革命；

- 經濟關係的組織已然轉變；
- 政治活動和牽涉其間的社群正在改變；
- 國家和其權威已經窮途末路。

這四項論點彼此相互關連。社會革命的觀點和經濟關係組織方式的轉變密不可分。經濟關係的轉變也通常牽涉到政治版圖的變化，而在這些轉變陸續產生後，動搖國家角色的可能性亦隨之大增。因此，我針對這四項主張所提出的批判，正點出本書基本論點相互連結的部分，即活動形式雖然改變，但他們的本質仍舊如昔。我相信，世界的差異無法輕易且清楚地截然二分為「何者正在改變」或「何者一成不變」，在形式與本質之間的劃分亦然。雖然「形式的改變與本質之間的區別」這樣的說法也許過度簡化，但這句話恰可完善地歸納出我的立場，因此我無法迴避之。

## 壹、資訊社會的概念

資訊社會的概念最早始於一九六〇年代初，一開始是被用來解釋當代社會的發展，但直至一九八〇年代，資訊革命的論點依舊飽受質疑。然而，在最近一般宣稱全球化資訊社會(充滿危機)來到的浪潮中，批判性聲浪卻顯得沉默許多。資訊社會的早期分析，從一九六二年，馬克普(Fritz Machlup)(譯者按：普林斯頓大學經濟系名教授，指出知識經濟將成為人類社會的重要特質)的開創性研究《知識在美國的生產與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到波瑞(Marc Porat)

於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所探討的《資訊經濟》(*The Information Economy*)，都集中研究美國的現象。直到一九七六年後，研究者的目光才開始移往美國之外的地區(Poirier 1990: 247-9)。到了一九九〇年代早期，人們對於資訊社會的興趣看似不若以往，但隨著網際網路逐漸成為強勢的大眾媒介，人們對資訊社會的關切又大幅提昇了。因此，我們可以將資訊社會分析區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1. 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期，分析完全聚焦於美國；
2. 從一九七〇年代晚期到一九九〇年代早期，隨著富裕或先進國家更廣泛採用資訊傳播科技後，分析的目光便開始遠離美國本土；
3. 現今，集中於探討網際網路潛質與前景的分析，則持續廣泛地關注全球化資訊社會。

無須訝異的是，隨著新資訊與傳播科技愈趨普遍，人們對於這些科技所帶來之社會衝擊的質疑，也會逐漸加深。

在那些較早察覺到資訊社會將影響全世界的地方，人們所關切的重點通常是，新知識(想法與科技技術)如何由核心國家向開發中國家流動(或不流動)等知識輸出的問題，而非晚近對網絡化世界的探討(Porat 1978; Dizard 1982: 148ff)。實際上，聯合國教育、科學與文化組織(MacBride et al. 1980)和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Friedrichs and Schaff 1982)這兩個組織，都曾在一九八〇年代早期，提出批判資訊與傳播科技及全球化社會發展的報告。然而，最近則有更多有力的國際政府組織開始強調(全球性)資訊社會的好處，及其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有三

個例子可用以說明：世界銀行公布的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世界發展報告：知識的發展 (World Bank 1999)；聯合國發展科學與技術委員會的一份重要報告：知識社會：永續發展的資訊科技 (Mansell and When 1998)；以及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發佈的政策性言論，如邁向全球資訊社會 (OECD 1997) 等三份報告，都認為資訊社會的誕生已是既定的發展邏輯。

即使學界在一九六〇年代掀起一股分析資訊社會概念的熱潮，但這並不表示過去沒有論者察覺到知識和/或資訊所蘊含的經濟價值。奈特(Frank Knight)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益》(*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書中，便精闢地闡述知識活動以及知識勞動者的重要性。潘洛絲(Edith Penrose)在一九五九年出版的《企業成長的理論》(*Theory of the Growth of the Firm*, Penrose 1995)，也指出知識資產的控制與發展管理是企業發展的核心要素。察覺到知識或資訊或許有利可圖，想當然爾則是年代更為久遠的事了。視專利權具有價值的想法則已有數個世紀的歷史，著作權是為了保障創造性作品的獨佔權，保護商標則是因為體認到經營者獨佔某商標使用權，而得以獲利的事實(Sell and May 2001)。但直至一九七〇年代，資訊仍被視為不過是多種輸入品或資源的其中一環，知識則無庸置疑地經常被預設為難以捉摸的存在。隨著現今資訊社會的誕生，資訊便成為企業家強調的輸入資源，對知識控制(和知識取得)的日益重視，則意味著知識**必須要能被掌控**，以終結它「自由」分配的特性。這些發展趨勢正是引出新時代降臨的預言。

## 一、「資訊社會」成為分析性概念

資訊社會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馬克普的研究，他是最早

將知識和資訊工作由「一般」工業與社會活動中抽離，使其自成一類的學者。他把能夠測量並分配經濟價值的行業分成五大類：教育、傳播媒體、資訊機制、資訊服務、其他資訊活動。此一分類方式，以及其所具備的統計測量性，讓馬克普得以在《知識在美國的生產與分配》中宣稱，早在一九五八年，美國便約有百分之二十九的國民生產毛額來自這些「知識工業」(Webster 1995: 11)。一旦建立計算基準後，我們就有能力去估算這些行業膨脹的規模，並成為爾後聲稱資訊社會誕生之論者所依循的證據。

杜拉克(Peter Drucker)如果沒有馬克普的研究，便不可能在數年後指出，戰後時期「我國的經濟基礎由手工業轉為知識工業，且我國社會開銷的重心也由商品轉為知識」(Drucker 1968: 287)。杜拉克在《不連續的時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一書中，花費了將近半冊的篇幅討論「知識技術」和「知識社會」，他認為「廉價、可靠、便捷與無遠弗屆的資訊帶來的衝擊，輕易地就和電力所帶來的影響並駕齊驅」(Drucker 1968: 27)。杜拉克的概念，日後也成為貝爾(Daniel Bell)的研究重心，但杜拉克強調，過往發展的進程必須仰賴經驗的傳承，但今非昔比，「有系統、果斷又有架構的訊息」才是先進社會想採納的資源(Bell 1968: 40)。馬克普的研究讓這類論調成真，甚至有加乘的作用。

一九七〇年代中期，波瑞延伸這份統計性成果，他在《資訊經濟》(*The Information Economy*)，一份受美國政府委託的報告，是廣受引用並影響深遠的九冊鉅著中指出，過去便存在著主要(the primary)與輔助(the secondary)這兩種互補的資訊部門。在主要部門內，知識產業操控知識和資訊，以生產出全新的知識商品和服務。在輔助部門，知識和資訊的操控只是

物質生產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資訊只在產製(物質生產)及銷售(提供服務)的過程中被利用。這篇報告指出,這兩個資訊部門的加總,佔了美國一半以上的經濟活動(馬克普估計此一數據將持續上升),此一事實讓波瑞歸納出美國將迅速地轉變為資訊社會的結論(Webster 1995: 11-15)。由於擁有數量龐大的統計數據作為佐證,加上被人們廣為宣傳的結論,波瑞的報告於是成為關切社會轉變議題論者所持的重要證據之一。

儘管經濟活動是上述分析的主要關切點,但這些研究也都暗示著,科技發展及其後續的社會衝擊間存有清楚的關聯。這也促使狄拉德(Wilson Dizard)將波瑞文中所指出的「兩個部門」加以重新概念化,並區分出美國轉變為資訊社會所歷經的三個階段,而不是只停留在工業部門的層次來討論。在第一個階段中,大型企業採用和研發各種資訊技術以生產新的科技產品;第二個階段,這些新「工具」則開始被資訊產業與服務業所採用;最後的第三個階段(也是最為廣泛使用資訊的階段),資訊技術的使用變得相當普及而形成嶄新的網絡,並主導社會的資訊流向(Dizard 1982: 7)。也就是在第三個階段中,新科技的社會衝擊才浮上檯面。「透過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廣泛使用,得以推動資訊社會的成形」這個概念,直到今日仍具深厚的影響力。

## 二、資訊社會的意涵

約莫就在波瑞匯整報告的同時,貝爾也在《後工業社會的來臨》(*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974)一書中,察覺到類似的社會轉變。但貝爾認為,在轉變過程中,還有三個不同的變化值得留意:理論性知識將愈益重要(社會「軸心原

則」的改變)；社會在轉型時，對未來的憧憬將凸顯科技、科技掌控及潛力等議題的重要性；以及出現全新的決策過程(Bell 1974: 14)。貝爾主張社會活動的組織方式(達成決策的方法)，可以被當作「智識技術」(intellectual technologies)以「典範」的姿態向外傳播；成功的技巧將成為其他行動者與團體爭相仿效的對象。更有甚者，「知識特質的轉變 就是社會中結構轉變的主要來源」，這是一項「以技術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轉變(Bell 1974: 44-5)。新知識秩序將逐漸制定出何種問題才是應被重視的議題，並透過將所有問題均簡化為科技議題的方法，決定哪些問題可成為重要議題，哪些則否。

專家和高級技術人員的地位在資訊時代中將大幅躍升。貝爾認為自古以來知識便是社會運作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

知識本身特質的轉變才是後工業社會的特點。理論性知識的重要化將影響組織決策與方針的改變 理論的重要性超越了實證主義，而將知識轉變為抽象的符號系統 可以被用來闡釋許多不同與多元的經驗領域。

在後工業社會中，「專家是關鍵人物」，他們提供了「服務及便利的措施，包括健康、教育、消遣和藝術，如今都被視為每個人嚮往與可能擁有的生活要素」(Bell 1974: 127)。貝爾將後工業社會定義為「人群之間遊戲」的新組態，是個人化社會實存的領域。當個人成為知識的擁有者和使用者後，階級和團體都將被邊緣化(sidelined)，取而代之的領導者是(曾受到啟蒙的)技術人員的主管。即使現在很少有人會追溯到貝爾的研究，但專精個體化知識的社會行動者崛起的概念，可以說是資訊時代中最常被提及的特質之一。

在另一份新時代效應的早期研究中,托夫勒(Alvin Toffler)認為一九六〇年代晚期,人們經歷的混亂及不安感和「未來震撼」(future shock)的情節直接相關,也就是人們認為自己可能無力應付資訊時代初期的劇烈轉變(Toffler 1970)。托夫勒後來提出的說明指出,這是因為後工業化的資訊社會「並非工業社會的直線延伸,而是方向的徹底轉換——這種全面性的轉變,至少可以說是一場猶如革命般」的工業革命(Toffler 1980: 366)。在資訊社會的文獻中,引起共鳴的正是這種與過去斷裂的組織社會新方式(托夫勒涵蓋的範圍從心理學延伸至國際性的社會關係)。美中不足的是,或者正是因為他們的「新聞腔」,故許多最早將這些觀點提供給觀眾的研究者,包括托夫勒和耐斯比(John Naisbitt) - 後者所著的《大潮流》(*Megatrends*, 1984)也強調資訊傳播科技趨勢所帶來的轉變 - 反而被學術圈拒於千里之外。

一旦和後工業與資訊社會的相關分析出現後,後繼針對此新時代與其效應的討論便紛紛出爐。實際上,史密斯(Anthony Smith)曾經指出這些後工業主義的早期研究,「都閃耀著黑格爾式的光環。資訊科技被歷史的精神所滲透——(且)在具體化資訊與傳播社會概念的行動中,活化了許多轉變的力量,或至少提供了(朝向資訊與傳播社會)發展的政治加速力」(Smith 1996: 72)。這段話意指有關資訊社會嶄露頭角的論點,透過研究者們宣稱並承認的「社會經濟關係的重整」,更加速體現了他們聲稱觀察到的變化。後工業社會宣稱資訊時代來臨的分析,其實本身就是促進新社經關係「事實」的大功臣。這些改變顯得既真實且贏得熱烈的迴響,透過此一主張,社會和經濟發展於是得以朝向特定的方向前進。認為此發展已付諸實行的分析,其本身便有助於資訊社會的發展(或

甚至支撐資訊社會的發展)。所以很重要，相信「資訊社會」是我們正邁入新科技時代的一項特質這個想法，其實本身就是一個自驗預言。

### 三、傳播社會與資訊社會

經常有論者主張資訊與傳播科技所帶來的變化，已經扭轉過去我們認識世界的方式。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讓這個論點成為人們目光的焦點，他擅長炒熱容易引起話題的詞彙，並成功的讓像是「地球村」、「資訊時代」和「媒體即訊息」等口號普及化。麥克魯漢從歷史的觀點看待資訊革命，他將焦點集中於最早於十五世紀誕生的印刷術革新。他主張此一假定是鑲嵌於印刷術的再生產能力(將分離的語言和資訊轉化為可再結合的單元)，隨著知識分配的擴張愈趨普遍，印刷術的創新宛如一場革命，它讓所有印刷品變得易於取得(McLuhan 1962)。延續著對於「印刷文化」衝擊的分析，麥克魯漢接著將關切焦點轉到當代科技改變所帶來的影響，並在一九六五年時首度印行 備受矚目的《透視媒體》(*Understanding Media*, McLuhan 1994)一書中特別強調這個議題。想要理解麥克魯漢並非易事，但他對於新傳播科技與實踐之轉變潛力的討論，仍舊影響深遠，更遑論許多他所提出的概念，還都在目前的討論中佔有一席之地，儘管人們多半未發現這些概念來自麥克魯漢。

在《透視媒體》一書中，麥克魯漢花費了一些篇幅將媒體區分為熱媒體(封閉的、單向性/傳遞完整的資訊)以及冷媒體(開放性、多向性/需要參與的互動資訊)，此一劃分是希望強調出網際網路中介的資訊網絡，將為人們帶來互動性影響。從

此書副標題：「人類的延伸」(The Extensions of Man)中，麥克魯漢還指出新的「冷」科技拓展了我們的能力，並大幅提昇過去飽受時間或空間所侷限的實踐活動。然而，新科技同時迅速地將這些發展化為自然之事，並讓它們看來像是「家常便飯」而非創新之舉。當馬克普還在試圖將一九六〇年代早期新科技所促成經濟轉變進行量化時，麥克魯漢早已想著有關社會科技導向轉變的議題。社會通常被視為其內部所有媒介傳播的總和，而科技對媒介的衝擊(透過傳播，科技對社會的衝擊將更加普遍)也因此仍在新時代的多數研究中佔有核心位置。

以波斯特(Mark Poster)為例，他就借用並延伸了麥克魯漢著名的「媒體即訊息」觀點。波斯特描繪出三個不同的「資訊模式」，標誌出社會中不同的知識傳播途徑與存在方式，並主張資訊模式「不同的結構變化，可以將歷史切割為不同時段」(Poster 1990: 6)。不同時代有著迥異的傳播方式，且將產生不同的社會型態。他試著將主要的階段區分為：「面對面」透過口語中介的互動；藉由印刷中介的寫作互動；以及通過電子方式中介的互動。第一個階段「具備象徵性聯繫的特徵，而第二個階段的特徵是符號圖像，(相對於此)第三個階段則是由資訊性的刺激所構成」(Smith 1990: 6)。此三階段並非連續不斷的關係：儘管就歷史順序而言，每個階段都晚於前一個階段，但他們並不彼此取代，更貼切的說法是後一個階段堆疊於前一個階段之上。隨著新資訊傳播科技的一日千里，不只出現新的資訊模式(「電子式的媒介交換」)，前兩個模式的特質也都因此產生轉變。當符號可以跨越遙遠的距離而被呈現(和接收)，並享受更豐富的資訊潮流時，面對面的傳播也不再受到雙方距離遠近的侷限。

當「每一種保存與傳輸資訊的方法，與構成該社會的關係

網絡緊密交織時」，就會造成社會本身的深遠改變(Poster 1990: 7)。資訊社會的大部分討論，都圍繞著對於傳播抱持此觀點的各種論述而展開。資訊社會不只是當代社會性質的一項轉變，也並非以往社會內部傳播方式轉變的倒影，資訊社會的意義遠勝於此。或許誠如波斯特的形容：「約莫兩百年以來，組織現代社會的堅固制度規則，如今被電子媒介傳播的衝擊所撼動，並重新組合為輪廓至今仍模糊不清的嶄新規則」(Poster 1990: 14)。藉由資訊與傳播科技的使用，新社會和新社群得以重新建構，這意味著資訊社會將從其原生社會中脫胎換骨。雖然和原生社會還存有關聯，但這些關聯也將透過資訊傳播科技的使用與設置而被重新形塑。

因此，個人的賦權(empowerment)以及他們傳播的潛質，一直都是分析資訊社會重要轉變的核心研究。在這個傳播新時代內，戴森(Esther Dyson)主張，我們必須要釋放自己，因為藉著投入/支持網路資訊，網路成員從中享有的好處將以倍數成長；我們應該在既有的社群中扮演積極的角色，或者建立屬於我們的社群；且經由網路供給我們獨創的「產品」，幫助提昇自身以及他人的福祉(Dyson 1997: 281-6)。資訊社會的要點(以網際網路為媒介)，在於劇烈地去中心化的傳播過程；個人可以透過社群網絡來重建本身的社會。然而，此一去中心化，同時也導致真實的社會指標(職業、外貌)變得支離破碎，並可能阻礙認同的建立，因此托克(Sherry Turkle)認為資訊社會到來所宣告的一項重要轉變，就是線上溝通的(潛在)匿名性，讓人們能夠建立(或重建)自我認同(Turkle 1997)。例如著名的「紐約客」(*New Yorker*)漫畫就曾描述一隻坐在電腦前的狗：「在網際網路上頭，沒人會發現你不過是隻狗」。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在互動中挑選所要扮演的角色，且從不侷限於單一角色，

我們大可以在不同的場合呈現不同的「自我」, 從社會的束縛中解放自己。

#### 四、從資訊社會邁向網絡社會

最早針對資訊社會提出的評論, 長期關切著社會(及其經濟)的轉型, 而繼起的評論則關注我們自身的轉變。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將這兩派分析結合在一起, 指出資訊傳播科技已經製造出一個全新的社會類型, 亦即網絡社會(Castells 1996, 1997a, 1998)。必須提醒讀者的是, 柯司特絕非指出資訊傳播科技廣泛散播後, 所帶來之網絡可能性有多麼重要的第一人。實際上, 大約在二十年前, 這個看法正是法蘭屈(French)《社會的電腦化》(*Computerization of Society*)(Nora and Minc 1980)一書的重點, 不過柯司特無疑地創造出他獨有的詞彙。在此, 我並不摘要柯司特影響深遠的研究成果, 不過我將扼要地歸納數個貫穿於其資訊時代討論中的核心論點。

柯司特透過詳細地解說, 指出資訊傳播科技的發展正創造出一個網絡社會, 其中無論是公司企業和個人, 都可以從新傳播的力量中獲益匪淺。電子中介的網絡支撐著知識與資訊的發展和傳播, 並加速適應與探索的速度。如同其他論者般, 柯司特也認為發展的過程已經由依賴個體資源, 轉變為更加依賴知識與資訊的流動性與協調性。這都促成資訊資本主義和網絡社會的誕生。柯司特為本身的論點作結, 認為此轉變是三項變化所導致的結果, 其中包括: 自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加劇的資訊科技革命; 一九八〇年代後期, 資本主義的再建構, 其中最為顯著的是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轉變; 以及在一九六〇與一九七〇年代出現的社會運動, 其中最重要的是女性

主義與環境主義(Castells 1997b: 7)，它們截至今日仍舊是重要的社會運動。這些社會變遷刺激全球資訊經濟的出現以及工作轉型，於是降低了勞工的標準定義，彈性化更成為常態，而勞動階級也變得「個人化」(de-massified)。

伴隨著這些經濟轉變的是社會特質的轉變。在三冊的篇幅內，柯司特討論到這些發展中，還包括財富不均的深化。柯司特眼前的資訊時代並非盡善盡美：儘管經由傳播的助力，世界被更為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不過仍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社會的破碎與混亂。此外，社會也朝向影像的魅惑(同時存在於文化事務與政治中)與傳播空間的商業化(或封閉化)發展。資訊與傳播科技的普遍發展，促使時間與空間二者產生嶄新的關係。類似許多關於全球化的討論，柯司特提出新的「永恆時間」和「流動空間」，換言之，時間不再從屬於僵固的時序，它可以透過資訊的蒐集加以累積，也可以透過跨越世界的非即時傳播予以壓縮；我們世界的空間構造，如今更加倚賴於圍繞著網絡(經由社區協商所出現的空間)流動的電波，而非緊緊依賴軀體所處的方位。這一切都引領著我們朝著新時代，亦即資訊時代大步邁進。當然，柯司特的研究所呈現的是更加複雜的資訊社會觀點，而非如同其他人指出的誇大不實。此外，就如同其他論者，他也歸納出數個問題點，而這些我將在後頭的章節中進一步討論。

## 貳、資訊社會的四個核心論點

論者針對資訊社會提出論點時，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可以

區分這些論點各自依循哪些殊異的基礎。例如,韋伯斯特(Frank Webster)就在他的研究中區辨出五種取徑:科技的、經濟的、職業的、空間的、文化的,並對於每種取徑提出特定的解釋(Webster 1995, ch.2)。且韋伯斯特更針對這五種取徑,各自講述一段負面與正面的故事,以呈現資訊社會帶來的社會影響: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無獨有偶的,道夫(Alistair Duff)則對資訊社會採取三種思考方式:資訊經濟論點、資訊流通取徑以及資訊科技取徑(Duff, 2000: 170, 散見於全書)。然而,本書將採取不同的程序。我的焦點放在討論資訊社會誕生時,大多會提及的四個重要相關論點,並在本書其他篇幅中逐一提出質疑。

## 一、社會革命

在資訊社會的討論中,最重要的就是認定新資訊科技是新時代領航者的論點。在一九七八年對法國總統提出的報告中,諾拉(Simon Nora)和明克(Alain Minc)指出:「電腦並不是近年來科技上唯一的發明,但它卻是加速其它發明進展的普遍要素。尤其電腦負責處理與儲存的資料數量是如此龐大,它將改變社會組織的整體神經系統」(Simon and Minc 1980: 3, **粗體字**為本書所強調)。在新資訊傳播科技的帶動下,資訊社會象徵的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或者,如同比爾蓋茲(Bill Gates)晚近的推測,「全球性的互動網絡將為我們帶來文化的轉變,其刺激不亞於古騰堡(Gutenberg)於中世紀發明的印刷術」(譯者按:古騰堡為德國人,於西元一四五年以活字版印刷術印出《Constance Mass Book》一書)(Gates 1996: 9)。無所不在的電腦化(經由網際網絡相連結),將相當於印刷革命的效應,縱橫交織於社會中。另一

個經常被拿來作比較的是，電腦革命「是至少與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成果並駕齊驅的關鍵歷史事件，含有促使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物質基礎產生斷裂的潛質」(Castells 1996: 30)。如此，電腦革命廣泛地與兩個過去的「革命」互相比較，分別是印刷術的誕生以及工業組織的轉變。此外，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認為電腦革命是難以逆轉的歷史事件：「就像是自然的力量，數位時代是無法被阻擋的」(Negroponte 1995: 29)(譯者按：尼葛洛龐帝一九九五年以《數位革命》一書，向世人宣告數位時代將取代原子時代)。由於許多論者普遍認為，人們將難以抵抗資訊社會所帶來的諸多深遠改變而深受影響，故他們主張我們正邁入一個新時代：亦即資訊時代。

這些針對電腦革命所提出的各種論調，都隱含著許多問題(這點我將在下一章中詳細討論)。其中最為顯著的是，這些論調牽涉到的社會觀點，都預設科技扮演決定性的核心要角。實際上，對科技的理解被化約成本身特質對整體社會所產生的作用。然而，科技的發展有特定的社會環境脈絡，且其發展也反映出當代的社會關係。科技(其「特質」)及社會這二者之間的關係，要遠比單向的宿命論複雜許多。更有甚者，許多抱持革命觀點的論述，在標誌出以新傳播科技為基礎的深遠改變時，卻簡化了資訊科技的歷史。一旦我們能夠理解相關科技及其與全球社會的互動，都曾歷經一段漫長的孕育期，那麼革命的論調就顯得有點牽強。但是，在這類論點內仍存有三種問題不一的條件。

## 二、新經濟

第二個核心論點則帶入了最常被探討的「新經濟」。諸多

關切資訊經濟的研究構成了所謂「加州意識型態」(Californian Ideology)的基礎,而佔據其思想核心的想法是「既存的社會、政治和法定權力結構將逐漸衰退、凋零,並被自主個體擺脫束縛後的自由互動所取代。」(Barbrook and Cameron 1996: 53)。資訊經濟下的受雇者,將不再是某個單一且專屬的團體(或「階級」),取而代之的是諸多個別化契約下的破碎網絡企業。向國外採購零件策略的興盛,造成勞工生態的重新切割,計畫導向的契約關係則打破了過去企業長期雇用的作風。相對於製造業的發展,服務部門的工作機會亦大量增加。服務業的崛起意味著朝向「微重量經濟」(wightless economy)發展,也代表產品不再具有實體,但往往具備資訊性(因此稱之為微重量)〔譯者按:因此除了微重量經濟一詞外,資訊時代的產品也被稱為「非物質商品」(dematerialize products)或「無實體商品」(intangibles)〕。「這些日子以來,多數身處於最先進經濟環境的人們,壓根沒有製造出可以被稱斤論兩的產品,他們的產品包括傳播、電腦軟體、廣告行銷和金融服務。人們交易、寫作、設計、高談闊論、絞盡腦汁和創作,但很少真正作出什麼來」(Leadbeater 1999: 18)。此一論點相當清楚:處於這個新資訊經濟內,我們的工作型態主要是勞心而非勞力,這樣的工作類型最容易被理解的是與服務相關的產業,例如資訊的供給和知識的採用相關者。工作的內涵業已轉變,人們的勞動實踐朝向彈性化發展,這使得勞動者得以更輕易地出售自己的專業和技能。在此新經濟內,好點子是最值錢的,知識才是最重要的資源。

我在第三章中會詳細地檢視這些論點,並指出當他們描述近期某些工作行為發生轉變的原因時,卻忘了考慮當中的連續性,這樣的作法其實隱藏了工作的某些部分,反而回歸到我們熟悉的工作行為的事實。雖然對於某些勞動者而言,

新經濟的到來鐵證如山，但其範圍與影響仍有侷限。經常被拿來證明這些轉變的勞動統計數據，其實根本無力支撐這些結論。此外，服務業的真實情況是，管理者與僱主仍奉行過去的勞動作風(包括監督和控制)，甚至在某些例子中，這些控管還因為資訊傳播技術的誕生而更加滴水不漏。廣義而言，「新經濟」中經濟關係的連續性，是倚賴資訊與知識所有權成功地擴張為基礎，故所謂的新經濟大抵而言一點也不新。

### 三、資訊政治

在討論前網際網路(pre-internet)的資訊社會時，政治和社群的改變都集中於專家的興起，以及他們可能享有的權力(像是貝爾於一九七四年的研究)。以波瑞特為例，他宣稱「管理者—科學家—專家成為新一代的騎士，吸收了過去資本主義者、地主、將軍和教士所掌握的權力」(Porat 1978: 79)。知識與資訊的控制者：技術官僚，將重新制定過去典型社會中，由財富、擁有土地權貴、軍事與宗教力量所主宰的規則。不過當資訊傳播科技於九〇年代變得愈趨普遍化後，主動的新政治「社群」出現的可能性，也就成為資訊社會研究的討論軸心。這些社群將「擺脫地理環境的限制」，個人將依其殊異的政治旨趣，歸屬於不同的網際社群，且懷抱著不同程度的認同感(Dyson 1997: 32-3)。因此，不僅是新的社會團體正在成形，同時它們也將動員四面八方的個體，加入有效(合適)的利益團體，於是逐步提昇個人對於政治過程的影響力。在這個概念下，「新社會運動」可以視為資訊時代政治社群的代表。人們因其對改善生活及政治旨趣的基本訴求而聚集在一起，這無疑是宣告嶄新的網絡政治已經浮現。

這表示在資訊時代,民主內涵和參與模式的性質正在改變。儘管虛擬網際網路仍舊存有使用與控制公共空間的問題,但我對於宣稱這些轉變的真實性較不存疑。政治活動的參與方式看來確實產生轉變。然而,雖然壓力團體(譯者按:為本身利益試圖影響輿論或政府的團體)和政治選舉都廣泛地使用資訊傳播科技,我們卻難以證實這些科技所挾帶的政治效能。且縱使國家保有關鍵的政治角色,許多政府卻發現很難(或毫無意願)與他們的公民建立起有別於以往的互動形式,於是只好繼續倚賴既有的、嘗試與實驗性的網絡。資訊社會的到來也造成某些政治難題的惡化,隱私權與審查制度是當中最常被觸及的兩個問題。我將在第四章中檢視社群與政治生活性質轉變的議題,不過這些議題也引導出資訊社會的第四個核心論點。

#### 四、國家的衰退

資訊社會的討論對政府存有潛在的不信任感,並經常以直言不諱的形式呈現,這種方式使得市民社會足以成功地對抗國家,因為國家已經過時且不再(如果它曾經)是組織社會最有效率的方式。儘管這種說法不盡然意味著國家的徹底崩潰,但「當老式的層級官僚政治變得與新世代毫不相干時,國家將勢必變得更加開放」(Tapscott 1998: 265, 290)。中央集權的政治權威角色仍有餘威,但在資訊時代,這種政治類型將大幅銳減。然而國家會試圖緊握權力,也因此民主將持續對抗政府對社會的宰制。另一方面,民主派論點指出,國家干預的權力已經注定必須向資訊傳播科技低頭。這個論點留意到世界模式下的國家,將受到與全球化有關的社會、政治

與經濟關係的左右。雖然國家從未能夠宣稱在國內政治經濟上握有壟斷權，但「資訊革命」已經毀損國家為圖一己之利，控制資訊的能力，這對國家的整體權威造成更嚴重的後果。當某些國家仍強硬的大顯威權時(無論是刻意漠視資訊傳播科技，或正因為有資訊傳播科技的撐腰)，普遍而言，國家在許多領域已遭受資訊社會的挑戰，而至少在過去一個世紀內，國家的權威在這些領域內是所向無敵的。

我將在第五章中提出，即使論者經常預言國家衰退的死訊，但這個想法卻很難成真。不光是許多國家為回應資訊革命的到來，已經相當成功地組織本身的經濟；認為國家無須扮演要角、革命也能發生的看法也存有謬誤。諸多對於資訊社會的分析，在將市場概念具體化時，都忽略資本主義社會內法律制度的關鍵地位。更重要的是，由於新經濟對智慧財產權的倚重，因此若欠缺強硬的國家權威，資訊社會的經濟便將無法運作。更直截了當的說法是，唯有模糊法律與權威在社會中的角色，才能宣告資訊時代國家必將遭逢衰退。儘管國家的角色正在轉變，但對於國家所管理的社會而言，它們的地位仍舊舉足輕重。

## 五、更待何時？

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將逐一探討、更加仔細檢視這四個重要論點，並指出它們在描繪「新時代」時的某些缺陷。我並不是說這四個論點就足以將有關資訊社會的討論一網打盡，不過對我而言，這四個論點堪稱當代論辯的核心主題。資訊社會的文獻至今已有至少三十年的發展，我們可以拿一九七〇與一九八〇年代龐大數量的批判研究為證。部分的早

期批判將可見諸於後續章節,並協助我發展出本身關於晚近資訊社會批判觀點的評論。寫作本書的原因之一是,當資訊社會的某些可能後果成為激烈政治論辯極為關切的主題時,資訊社會象徵社會轉型的預設,在今日於是被視為相對無須質疑的事實,因此反而更需要審慎地加以探究。烏托邦的奉行者持續對抗反烏托邦者,不過兩者都接受我們正邁入一個不證自明的新時代。

我在本書想要探問的是,當代社會是否正進入此一新時代,或者當我們辨識出某些重要的轉變時,是否也不應遺忘連續性這個重要的議題。由於人們長期以來都認為資訊社會即將到來,故預言這些事物在未來將「成為過去」,這樣的觀點就逐漸難以證明。如果在資訊傳播科技使用加速的時期,社會整體卻只浮現些許轉變的徵兆,那麼這四點主張看來根本無法被證實。我想要再一次強調,我並不是認為資訊傳播科技的廣泛使用和社會的任何轉變都毫無關連,或甚至主張新科技並未造成任何改變。但是當我們剝除資訊社會表面互動型式的轉變後,我們將發現物質連續性的重要。且如同我已提醒讀者的,雖然這四個論點是把後續章節中較為複雜與精密的主張以簡化的方式呈現,當中所凸顯的差異,對我們理解當代社會仍有其重要性。

**\*網路試閱版聲明\***

1. 敝社目前對書籍翻譯品質管控日益嚴謹，每本書都至少經過四校的把關程序，此試閱版已正式上市版本完全相同。
2. 讀者閱讀此試閱版本如果發現錯譯或不妥之處，歡迎讀者儘速透過電子郵件 (Email: weber98@ms45.hinet.net) 向敝社反映，以便在此書有再版機會時再次修正。
3. 如果讀者試閱此版本以後，對本書的內容有興趣，期盼各位讀者在本書正式上市後，踴躍購買。您的選購就是對本社最具體的支持，也得以讓敝社更加茁壯，出更多好書。

**\*版權所有，請勿做具商業屬性的運用\***

